

# 新出文献战国文本的差异叙述\*

杨 博

**【提 要】**依新出文献所记史事角度,不同种类的新出文献对于同一叙事主题(人物、事件)均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叙述差异情况。叙述差异的产生与战国时期文本编纂、流传的情境息息相关。“史”、“语”、“子”等取材于“世”、“书”等成书较早、材料较原始的文献,它们之间又互相影响,构成了战国文本丰富形态之一隅。不同文本的差异叙述,发展了“言公”与“私意”的论断。“言公”在于共同文化背景、共同目标的相同,而差异叙述的目的则在于发扬“私意”,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关键词】**新出文献 言公 私意 差异 战国文本

〔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52(2018)05-0136-09

新材料的发现对于中国古典学研究的意义重大。学者每论及此,多援引王国维所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sup>①</sup>作为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的四大发现之一,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简帛文献的出土与发现,引起了海内外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学者的极大兴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国际性的显学。正如陈寅恪所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sup>②</sup>

为便于同既往的出土文献相区别,裘锡圭先生提出将建国以来陆续出土的先秦典籍抄本(主要是战国时期文本)总称作“新出文献”。<sup>③</sup>笔者从史学角度将其主要分为“世”、“书”、“史”、“语”、“子”等五种。清华竹书《楚居》主要叙述自楚先祖季连开始到楚悼王共23位楚先公先王的居处迁徙,内容与《世本》之《居篇》相类,是新出“世”类文献的典型代表;战国时期“世”类文献的流行,还表现在“世”类衍生文献的涌现,清华竹书《良臣》即是一例。“世”类文献之外,清华竹书中有《金滕》《皇门》等多篇可与今本《尚书》《逸周书》之篇章相对照,似亦可归为“书”类。《系年》则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一种独立史著。“语”是战国时期流传的存故实、寓劝诫和助游谈的材料。除谚语外,其最显著的特征,即在于“故事”性。即每个篇章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独立故事,

\*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与历史文化资料整理研究”(16@ZH02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周诸侯墓葬青铜器用与族群认同研究”(17CZS005)的资助。

① 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页。

②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

③ 裘锡圭:《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4日。

基本是由故事背景+故事经过+故事结果组成，如上博竹书《昭王毁室》开篇以“昭王为室”为故事背景，“一君子丧服……”为经过，结果是“因命至（致）侖毁室”。此外，楚竹书中还有大量可归入儒、墨、道、法等诸家学派的“子”书，以儒家书为大宗。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常举典型人物、经典事迹以加强论说效果。楚竹书中就有不少“子”书涉及这方面内容。<sup>①</sup>

迄今为止，有关新出文献的文字释读、文本校勘等方面，学界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特别是文本校勘，刘娇<sup>②</sup>、单育辰<sup>③</sup>、西山尚志<sup>④</sup>等先生均有专著问世。但是就新出文献及其与传世文献叙述差异的史学角度分析来看，关注的学者还比较少，所见成果亦不算多。笔者拟在此方面对这一问题谈些粗浅看法，以供师友同好批评。

## 一、新出文献战国文本及其与传世文献叙述差异举隅

新出文献所涉及的战国文本问题，从史学角度来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人事的叙述趋同，二是人事的叙述存异。相同的方面自然可以直接用来验证过去的认识，或增补文献记载之不全，而差异的表现与原因则需要细细辨析，才可以用作史料以考订上古历史，此理毋庸赘言。

新出文献所涉及的文本叙述差异的问题，在笔者上述“世”、“书”、“史”、“语”、“子”等五种分类中均有所体现，而这种体现也有一些不同。按照文献种类和重复情况，试列举如下：

### （一）同类文献之间的叙述差异

#### 1. “史”类文献之间的叙述差异

清华竹书《系年》简文第十五章“陈公子徵舒娶妻于郑穆公。”<sup>⑤</sup>照此则夏姬是徵舒之妻而非其母。《左传》宣公十年所记陈灵公与大臣孔宁、仪行父之间以“徵舒似汝”相戏，<sup>⑥</sup>可见徵舒是夏姬之子。关于此事，《史记·陈杞世家》记载比《左传》稍详。同为“史”书，《系年》与《左传》《史记》的记载就存在差异。

#### 2. “语”类文献之间的叙述差异

“语”类文献在春秋战国时期非常流行。关于同一人物、同一事件可能有多个版本。这类文献是当时作史的基本素材。<sup>⑦</sup>这些不同的版本叙述之间亦存在差异。上博竹书《庄王既成》以楚庄王铸无射钟之事入题，通过君主铸钟之事引出故事主题，在出土、传世文献中都有例证。<sup>⑧</sup>学者认为，这些故事是同一个故事在各诸侯国形成的不同版本。如许科先生认为《左传》《国语》所见周景王故事、《曹沫之阵》所见鲁庄公故事和本篇楚庄王故事是同一个故事，“在周、鲁、楚国都衍生出不同的故事版本，故事主题是借铸钟一事而讲理，但又据各国情势之不同而在人物和内容上进行

① 参见拙作：《论楚竹书与〈荀子〉思想的互摄》，《出土文献（第五辑）》，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185~194页；《试论新出“语”类文献的史学价值——借鉴史料批判研究模式的讨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2期，第101~107页；《“六王五伯”与“九州十二国”——出土文献所见战国时人的史地认知》，牛鹏涛、苏辉编：《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论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9~256页。

② 刘娇：《言公与剿说——从出土简帛古籍看西汉以前古籍中相同或类似内容重复出现现象研究》，线装书局2012年版。

③ 单育辰：《楚地战国简帛与传世文献对读之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

④ 西山尚志：《古书新辨——先秦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对照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⑤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70页。为便利行文，下文引述整理者释文、意见等均出自此处者不再重复注明。

⑥ 《左传》卷22宣公十年，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版，第4071页。

⑦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97页。

⑧ 曹方向：《上博竹书所见楚国故事类文献校释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历史学院，2013年，第48~64页。

相应的转换和改编。”<sup>①</sup> 葛亮先生也认为，“《庄王既成》将鲁庄公铸无射钟的故事移植到了楚庄王的身上。”<sup>②</sup>

### 3. “子”类文献之间的叙述差异

“子”类文献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是在文章中常举尧、舜、禹、汤、文、武等所谓圣人事迹，朱、象、桀、纣、盗跖等恶人事迹以为其说树立楷模。其有关圣王明君等古史典型人物论说组合上亦存在差异。《荀子·议兵》篇有“四帝两王”之说，“四帝”指尧、舜、禹、汤，“两王”指周文王、武王。上博竹书《举治王天下》有“夫先四帝二王”之句，出于师尚父应对文王之辞。“二王”显然不是指周文王、武王，与《荀子》的“四帝两王”有别。疑此“二王”是指夏禹、商汤，“四帝”则所指未详。此外，郭店竹书《唐虞之道》有“六帝”一词，亦未详其所指，似应与“六王”有关。<sup>③</sup>

## (二) 不同类文献之间的叙述差异

### 1. “世”类与其它类文献之间的叙述差异

(1) “世”类与“书”类。清华竹书《良臣》：“唐有伊尹、有伊陟、有臣扈。武丁有傅说，有保衡。文王有闾夭，有泰颠，有散宜生，有南宮适，有南宮天，有芮伯，有伯适，有师尚父，有虢叔。武王有君奭，有君陈，有君牙，有周公旦，有召公，遂佐成王。”<sup>④</sup>《尚书·君奭》：

公曰：“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义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义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劝宁（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闾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宮括。……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祿。后暨武王诞将天威，咸刘厥敌。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单称德。”<sup>⑤</sup>

可以看出，《良臣》将殷商西周两代的“良臣”分别系于商汤、武丁、周文王、周武王的名下。而按《君奭》，伊陟、臣扈等为太戊时良臣，而非商汤之时良臣。

(2) “世”类与“子”类。《良臣》有“黄帝之师：女和、隤人、保侗。”《吕氏春秋·孟春纪·尊师》则曰“黄帝师大撓。”<sup>⑥</sup>

### 2. “书”类与其它类文献之间的叙述差异

(1) “书”类与“史”类。清华竹书《金縢》说“周公宅东三年”，宅与居同义，居东三年则与《诗·豳风·东山》称东征“自我不见，于今三年”，<sup>⑦</sup>《史记·周本纪》“管蔡叛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相一致。<sup>⑧</sup> 但与《史记·鲁周公世家》称周公“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有差异。<sup>⑨</sup>

① 许科：《上博竹书春秋战国故事类文献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8年，第151~152页。

② 葛亮：《〈上博七·郑子家丧〉补说》，《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48页。

③ 参见拙作：《“六王五伯”与“九州十二国”——出土文献所见战国时人的史地认知》，牛鹏涛、苏辉编：《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论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9~256页。

④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57页。为便利行文，下文引述整理者释文、意见等均出自此处者不再重复注明。

⑤ 《尚书》卷16《君奭》，孔颖达疏《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75~477页。

⑥ 《吕氏春秋》卷4《孟春纪·尊师》，许维遹撰：《吕氏春秋集解》，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1~92页。

⑦ 《毛诗》卷8~2《豳风·东山》，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846页。

⑧ 《史记》卷4《周本纪》，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132页。

⑨ 《史记》卷33《鲁周公世家》，第1518页。

(2) “书”类与“语”类。上博竹书《竞建内之》追述“昔高宗(武丁)祭,有雉雒于彝前”事与传世《尚书·高宗彤日》篇的记述相似,均是祖己对商王祭祀时的异事进行的评论。清华竹书中亦有《赤鸩之集汤之屋》篇,讲述有鸟“赤鸩”被商汤射获。商汤外出临行前嘱咐小臣伊尹将其烹煮作羹的故事。

(3) “书”类与“子”类。清华竹书《金滕》在记述周公将其愿代武王服事鬼神之简册纳于金滕之匮后,有:“就后武王陟,成王犹幼在位。”说明周公仅是摄政,并未称王。这与钱穆所认为《荀子·儒效》主张的周公称王说存在一定的差异。<sup>①</sup>

### 3. “史”类与其它类文献之间的叙述差异

(1) “史”类与“语”类。还可举《系年》陈公子徵舒的例子,《国语·楚语上》:“昔陈公子夏为御叔娶于郑穆公,生子南。子南之母乱陈而亡之,使子南戮于诸侯。”韦昭注:“公子夏,陈宣公之子,御叔之父也,为御叔娶郑穆公少妃姚子之女夏姬也。……子南,夏徵舒之字。”<sup>②</sup>上博竹书《容成氏》不仅记述五帝,而且还涉及乔结氏、壻暹氏等不见于文献记载的上古帝王名号,明显与《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体系不同,是有别于炎黄古史传说体系的另一种传说体系。

(2) “史”类与“子”类。上博竹书《竞公疟》即与《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景公病久不愈欲诛祝史以谢晏子谏》《外篇·景公有疾梁丘据裔款请诛祝史晏子谏》所记述之内容近似。上博竹书《竞建内之》与《管子》中《霸形》《戒》两篇内容相似,只是所涉人物与事件背景有很大差别。<sup>③</sup>

### 4. “语”类与其它类文献之间的叙述差异

此种情况可以“语”类与“子”类为例。上博竹书《鲁邦大旱》《柬大王泊旱》《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及《竞公疟》等灾异文献所讨论的共同主题,大都由于疾病、旱魃等神罚或日食等异象的降临,然后藉由国君的自省,“为善政”为解除或规避灾殃的有效途径,但是具体的人物故事与情节有着不小差别。<sup>④</sup>

需要说明的是,上列文献的种种叙述差异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内容。一方面囿于目前发现材料的限制,另一方面实际上这种有关同一主题(人、事)的重复情况是战国文本创造、流传的一个主要方面。上举上博竹书《鲁邦大旱》,涉及到“哀公问孔子”这一主题,清代学者马驥在《绎史》中专列《孔子类记一·哀公问》篇,汇集了《史记》《礼记》《大戴礼记》《论语》《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孔丛子》《孔子家语》及《说苑》《新序》等多种传世古籍中所见之材料,<sup>⑤</sup>限于篇幅,兹不赘引。

## 二、文本叙述差异原因具析

上述战国文本及其与传世文献间产生叙述差异的原因,似亦需要通过考察不同种类文献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复杂关系来探究。

第一,“语”与“子”。主题(人、事)的重复情况,在“语”、“子”两类文献中体现最多,差异现象的表现也最多。“语”与“子”之间,“语”与“世”、“书”、“史”等其他三类文献之间均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叙述差异。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是与战国时期文献产生、流传的方式分不开的。明

①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钱宾四先生全集》⑧:《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台)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13~115页。

② 《国语》卷17《楚语上》,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92页。

③ 刘信芳:《竹书〈鲍叔牙〉与〈管子〉对比研究的几个问题》,《文献》2007年第1期,第15~21页;鲁加亮:《〈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与〈管子·戒〉对读札记》,《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97~99、105页。

④ 参见拙作:《论史料解读的差异性——由楚竹书灾异文献中的旱灾母题入手》,《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80~87页。

⑤ 马驥:《绎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925~1957页。

代郎瑛即曾针对“秦汉书多同”的疑惑发表议论说：

予尝反复思维，岂著书者故剽窃耶？抑传记者或不真耶？非也。二戴之于《礼记》，彼此明取删削，定为礼经，其余立言之士皆贤圣之流，一时义理所同，彼此先后传闻；其书原无刻本，故于立言之时因其事理之同，遂取人之善以为善；或呈之于君父，或成之为私书，未必欲布之人人也，后世各得而传焉，遂见其同似。于诸子百家偶有数句数百言之同者，正是如此耳，此又不能尽述。<sup>①</sup>

郎瑛之说的重要性在于他指明了古书相同的缘由：“其余立言之士，皆贤圣之流。一时义理所同，彼此先后传闻。其书原无刻本，故于立言之时，因其事理之同，遂取人之善以为善，或呈之于君父，或成之为私书，未必欲布之人人也。后世各得而传焉，遂见其同似。”清代章学诚有著名的“言公”立论，就与此接近：

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sup>②</sup>

“言”所以为“公”，申“志”，其言则不必自有。“言公”，笔者理解其基本内涵应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言说的背景，表现在先秦诸子身上即是以“六经”为代表的知识背景，郭店竹书《性自命出》《六德》及《语丛》（一）等篇都透露出当时存在着《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称的现象。<sup>③</sup>学者亦从子学与经学的传承角度考察，得出“诸子各家皆有经，很多诸子学派也研究诗书礼乐”的结论。<sup>④</sup>

其二是言说的目标。以学界熟知的早期儒、道关系为例，过去学者依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sup>⑤</sup>而郭店楚墓中儒道两家典籍共出，似透露出早期儒、道两家为天下统一的政治目标而和平相处、同源共济的信息。学者仔细对比，发现今本《老子》中有很多与儒家思想截然对立的内容，在郭店《老子》中并不存在。<sup>⑥</sup>任继愈先生曾指出，郭店竹简的内容反映出战国中后期的社会，为结束战国纷争的历史，在统一的前夕，各地区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和有识之士，均在为统一天下构画蓝图。竹简内容反映了这一统一天下的理想。这一时期，各国各学派都有他们的设想，虽方法不同，目标却是一致的。<sup>⑦</sup>这个目标，就是“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其所言则“不必果为我有也”。

第二，“世”、“书”与“史”、“语”、“子”。“世”以人为主，以时为轴。古人作史，第一中心是“人”，主要是“世系”或“谱牒”，这是古代作史的第一框架。它是按氏姓、国族或家族的亲缘树谱来讲历史，常见的是“某生某”、“某又生某”。现存《世本》，虽然是清人辑本，或说原书成书于战国时期，但是这种帝系、王侯谱与卿大夫谱的渊源甚早。殷墟王卜辞中，对于商王世系即有明确的

① 郎瑛：《七修类稿》卷23《辩证类·秦汉书多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48页。

② 《文史通义》卷2《言公上》，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9页。

③ 廖名春：《论六经并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第47~58、65页。

④ 李锐：《子学与经学的传承比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86~92页。

⑤ 《史记》卷63《老子韩非列传》，第2143页。

⑥ 参见李均明、刘国忠、刘光胜、邬文玲：《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147页。

⑦ 任继愈：《郭店竹简与楚文化》，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记载。如黄组卜辞《合集》35406即记载了一份从甲戌日翌祭上甲，乙亥日翌祭乙，直到庚子日翌祭大庚，这样有序排列的十一王的完整祀谱，祀谱亦本于王世系谱。这类与“世”类有密切关系的文献在西周金文中也可以看到，西周早期大盂鼎（《集成》02837），时王列举“文王受天命，武王作邦，成王敷有四方”后要求盂“型乃嗣祖南公”。这种西周初期王世与族谱序列的发轫，经过西周中期的发展，到西周晚期则出现了紧密的一一对应关系，可举共王时期的史墙盘（《集成》10175）与宣王时期的逯盘（《汇编》757）为证。东周时期，江陵望山楚简卜筮祭祷记录，记有墓主“悼固”多次祭祀其已故的五世先人。新蔡葛陵卜筮类简，祷祠对象有楚文王、平王、昭王、惠王、简王、声王、坪夜文君、子西等。由是，陈伟先生认为战国时楚人封君一级祭祀七代先人，大夫一级祭祀五代先人。<sup>①</sup>可见，“世系”类文献与卜辞、金文、文书简等带有档案文书性质的文献存在莫大的关联。

“书”类文献亦是由档案文书修饰而来，其重要的区别是后者已具有明确的主题，并依据这一主题将简册记录的周王言行改编为具有可读性，并含有一定教化性或指导性等有政治性质的篇章。这种改编，李零先生认为即便是早期古书直接脱胎于文书档案，它也不应是文书档案中必然包含之种类。其之所以能成为后世意义上的所谓“书”，恐怕还是后人删选、改编的结果。<sup>②</sup>改编的方式，照“书”类文献记言为主、记事为主及言事相兼三种类型来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sup>③</sup>

其一是记言类篇章。这类篇章改编自史官对周王讲话的记录。由于特定的讲话时间短暂，目的明确，所以对讲话的记录能够做到首尾连贯，自为起讫。这样的讲话记录，只需稍加整理，即可以称为一篇完整的篇章。如清华竹书《皇门》，即便在管、蔡、霍叔等“三监”叛乱已平复的情况下，周人贵族集团内部仍围绕着王朝权力有着较尖锐的矛盾与斗争。特别是在当时王朝内服诸官中存在着种种危害于王朝的行为，其中尤以封闭良臣上达于王所的风气危害极大，此种风气已造成年幼的成王在用人上出现的偏差、影响到国家之安宁，故周公作此诰辞以训诫群臣。记言类篇章的制作，即记录和改编，几乎可以同时完成。

其二是记事或言事相兼型。“书”类文献虽以记言为主，但更多的“书”篇是言、事相兼型，如《康诰》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sup>④</sup>来交待时间、人物和事件背景，然后接着以“王若曰”开始记言。这类篇章改编自史官对周王言行的记录。事件与讲话的不同，在于其场景变化与人物不同，时间亦可是数天，数月甚或数年。在这漫长的实践过程中，并不会只有此一事发生，如清华竹书《金縢》“周公石（宅）东三年”就是史官对涵盖一个较长时期的言行原始记录进行了编纂。这就要求史官对同一事件的言行记录进行选择、提炼，使之成为一篇主题明确的篇章，所以相应的对史官技能的要求也较高。

改编的具体时间与过程，已然于史无证。《墨子·明鬼下》为阐明“鬼神之有”的理论，曾引证“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与“齐之《春秋》”，而以周之《春秋》“周宣王杀其臣杜伯”事为最早，其余各国“春秋”记事都在周宣王之后。在此之前，不引某国“春秋”，而引证《夏书·禹誓》《商书》和《周书·大雅》。《墨子》中的这些引证，或许正暗示了周宣王以前的事散存于《书》《诗》之中，周宣王以后的事，各国《春秋》可见。这就是说，《春秋》之作，起自宣王之时。<sup>⑤</sup>“春秋”的撰作，表示将“档案文书”改编为“书”也有可能，同时也启发了这种改编的

① 陈伟：《新蔡楚简零释》，《新出楚简研读》，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页。

②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第54页。

③ 参见张怀通：《〈逸周书〉新研》，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5~36页。

④ 《尚书》卷14《康诰》，第430页。

⑤ 刘乃寅：《中国历史编纂的起源》，《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120~129页。

自觉，由于周室“春秋”之修撰，于是带动了“书”与“诗”的编录。<sup>①</sup>

“书”类文献被改编完成以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一是在王朝官学中作为教育贵族子弟的教材，特别是春秋中期以后，因各种原因逐渐流入各诸侯国，并成为各诸侯国教育贵族子弟及后起的诸子教育弟子的教材。其二是作为共同文化背景使用在宴饮会盟、臣下进谏、著书立说等不同场合，以增加论说的分量。其三则是以其所记言、事为材料基础，以追述上代史事以达到“通古今之变”的目的。这也是“史”书创作的基本主干材料之一。

“史”书的创作，关注的是人、时、事、地四项，人的因素侧重在“世系”或“牒谱”，时间因素有“春秋”、“纪年”，事、地则有“书”所记言、事。<sup>②</sup>这是“史”书的主干。枝叶则需要融入记载大量丰富史事的“语”书以丰满。所以李零先生说，“语”是当时作史的基本素材。

“语”的大量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者社会地位降低决定的。<sup>③</sup>《国语》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贤士、大夫的说言高论，其与《尚书》记言限于官文书的性质是有严格区别的。<sup>④</sup>再从《尚书》《国语》之间“言”、“语”的细微差别来理解：

《尚书》之“言”基本上是君王对臣下所发布的诰命，多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国语》的“语”更多是对当政者的一种委婉劝谏。劝谏者即“语”者需要借助各种论据，使用有效方法，使上位者接受自己的意见。《尚书》等“书”类所记的言语局限在周王或是周公、召公等辅政大臣及祭公等耆老“惇史”的范围之内，训话的对象是臣民；《论语》除孔子外，只有少数几位贤弟子之言语，“语”的直接对象基本为门下弟子或问学者。《国语》记载的言语不是训话，而是劝谏，劝谏的对象是君王。劝谏和教诲都出于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目的，均需要列举一些当时人们熟知的人、事作为论据，以增加说服力，这部分内容也就是其时的共同文化背景。

综上所述，似可简单推导出战国文本的一个线性的发展模式，“诗”、“书”、“春秋”等“六艺”的改编与编订，在春秋战国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以至于形成时人共同认同的文化背景，从而能为“语”、“子”等文献的编纂者所用，借“不必果为我有”之言，而使“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即如图1所示。

当然，战国时期文献衍生、文本流传的途径并非线性单一的，图1也部分体现了这一特征。“史”、“语”、“子”不仅取材于“世”、“书”等文献，它们之间也是互相借鉴的关系。清华竹书《良臣》《楚居》的发现，已表明“世”类文献在战国时期仍有相当的创造活力。而上述史官创作技能的发展，战国时期私人学术的兴起，使得档案文书→书→史、语等的发展途径更加多样。《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有王子朝“告诸侯书”，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郑郕，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sup>⑤</sup>

① 饶龙隼先生经过分析，得出大概前750年前后出现夏书、商书、周书之称名；前650年始出现《书》之称名；春秋以前传写的应称为“书”篇，而不是《书》。《书》篇最早编纂于昭穆时期。参见饶龙隼：《上古文学制度述考》，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11~227页。

② 参见拙作：《战国早期的“四战之地”——清华简〈系年〉所记战国史事》，《文史知识》2015年第3期，第67~70页；《清华竹书〈系年〉所记战国早期战事之勾勒》，《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58~61页。

③ 李佳：《国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7页。

④ 白寿彝：《战国秦汉间的私人著述·国语》，《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0页。

⑤ 《左传》卷52《昭公二十六年》，第4591~459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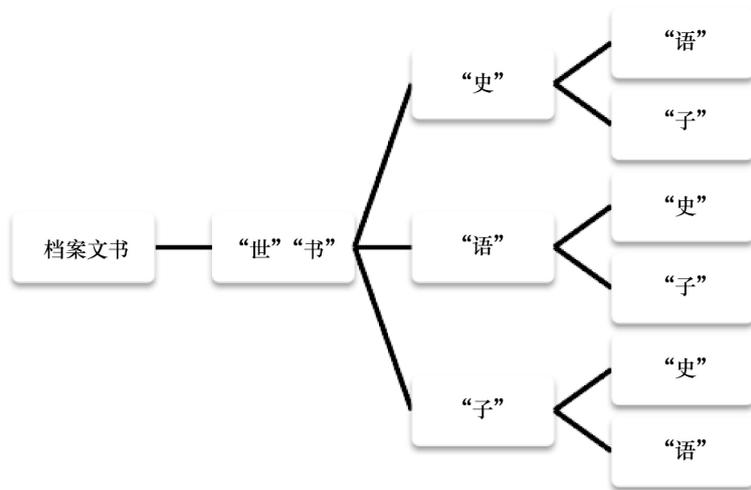


图 1 战国文本差异叙述示意

这不由得使人联想起清华竹书《系年》第一章简文。若深究下去，就会发现王子朝在作“书”回顾历代周王时采用的“昔武王……至于夷王……至于厉王……幽王……”的结构，与《系年》首章“昔周武王……至于厉王……宣王……”的句式相类。特别是王子朝描述“国人暴动”的“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一句，更是与简文若合符节。此外，王子朝“告诸侯书”中所提到的武、厉、宣、幽、携诸王之事，《系年》首章与次章亦多有涉猎，只是叙述立场可能存在差别，王子朝书中所谓“携王奸命”明显与“《系年》讲携王史事时明显的持幽王、携王立场”不同。<sup>①</sup>“告诸侯书”是档案文书，为史官在当时所记下。《左传》的编者在编撰中则直接将此“书”全文收录，这部分内容就是直接在档案文书基础上所进行的史书创作，体现着从文书到史书的发展过程。而采取不同立场叙事的《系年》所记与“告诸侯书”的相近，一方面印证了从档案文书到史书途径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说明档案文书的书写似也受到一种固定模式的影响。以先王为代表，对先王功绩或所处时代的历史大势有一个基本的概括。如“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等。

### 三、小结

新出文献中不同种类文本之间及其与传世文献的差异叙述，于“秦汉书多同”的论断是扬弃。章学诚的“言公”之说，得到了新出文献不同文本同一主题差异论说的验证，“秦汉书多同”、“言公”在于文化背景、目标的相同，差异叙述的目的则在于发扬“私意”，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自顾颉刚先生倡导古史辨派之后，有关史料考辨的观念已深入学者心中。战国文本的复杂性，因其作为史料载体而使得史料考辨的工作尤为重要。笔者以为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叙述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差异较多的“语”、“子”文献似均有所本，即其叙述主干大抵是可靠的。上博竹书《容成氏》以九邦来服宣传文王之德，《史记》对“平虞芮之讼”的记载同样反映了文王盛德。此外《左传》僖公十九年宋子鱼云“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sup>②</sup> 襄公三十一年卫北宫文子言“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帅服，

<sup>①</sup> 朱凤瀚：《清华竹书〈系年〉所记西周史事考》，李宗焯主编：《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出土材料与新视野》，（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13 年版，第 441~459 页；拙作：《〈系年〉“周亡王九年”诸说综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 年 2 月 27 日。

<sup>②</sup> 《左传》卷 14《僖公十九年》，第 3929 页。

可谓畏之”<sup>①</sup>及《吕氏春秋·用民》“密须之民，自缚其主，而与文王”<sup>②</sup>等所载文王伐崇、密须与简文伐丰、镐过程略似，均反映出文王盛德。

其二，史家叙事、诸子论说，既然有牵涉事件的叙述，就不可避免情节安排、人物描写及观点运用。诸子专以理论阐述为中心，虽然它也引用一些历史故事，但其目的主要在于阐明其思想理论，以至常常用自己的思想、观点来对历史故事加以改造。即便如此，在有意之外，诸子于无心之中却起到了记录历史、保存历史与整饬历史的作用。与之相应，史家的任务也不应只限于对历史事件做流水账似的记录，或对某一个或数个特定事件进行分析，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探究事件的来龙去脉，或在众多个体事件之间寻求内在关系，或从混乱而无条理的现象中找出特定的道理与意义，如此所谓“情节化解释”即被需要。<sup>③</sup>故鉏麇触槐前的内心独白需要鉴别，《史记·刺客列传》太史公所谓“天雨粟，马生角”亦需要考虑，<sup>④</sup>但是司马迁在论赞中还是提醒，尽管他用文学家的手法来写荆轲刺秦的故事，但他真正的目的仍然是在写历史。

附记：小文曾以《新出文献与战国文本差异叙述》为题，提交“出土文献与诸子学研究新境——第四届诸子学学术研讨会”讨论，得到与会谢维扬、廖名春、宁镇疆、李锐、齐航福等先生的指教，又蒙匿名审稿专家与责任编辑龚赛红老师提出宝贵意见，笔者谨致谢忱！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龚赛红

## On the Narrative Differences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Literature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Yang Bo

**Abstract:** After an analysis on the perspectives of newly discovered literature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t can be found that different kinds of these literatures show a certain extent of narrative differences for the same narrative subject (person or event). Narrative differe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mpilation and spread of the text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Shi”, “Yu” and “Zi” are based on the literatures like “Shi” and “Shu”, which were composed earlier and consisted of more original materials. All these literatures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constituting a part of the rich Warring States texts. The narrative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texts have promoted the judgments of “yangong” and “siyi”. “Yangong” means the texts have the sam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aims, whereas the advocacy of “siyi” is the purpose of narrative difference to express personal political views.

**Keywords:** newly discovered literatures; yangong; siyi; differences; Warring States texts

① 《左传》卷40《襄公三十一年》，第4378页。

② 《吕氏春秋》卷19《离俗览·用民》，第525页。

③ 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④ 《史记》卷86《刺客列传》，第2538页。